

2024年3-4月《收获》《上海文学》《天涯》《作家》《芳草》:

“新天使”悬停的时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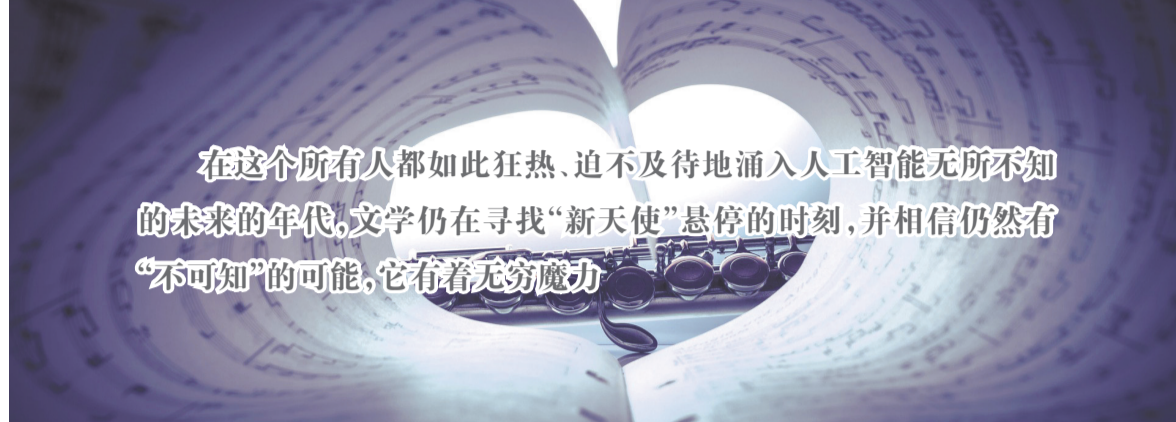
□梁皓皓

本雅明在他的《历史哲学论纲》中描绘了这样一个“新天使”，他背对着未来，面向堆积着残骸的过去，想要停下来修补世界，却被一场名为“进步”的风暴不可遏止地吹向天空。对于本雅明来说，“当下”是这场风暴灾难停止的时刻，也就是新天使悬停的时刻，历史地叙述，就是在这样一个悬停的时刻捕获那些不断再次闪现的“过去”的遗迹，由此过去的时代与此刻的时代共同形成了一组历史的星云。

作家们似乎也在寻找并描绘着属于他们的“新天使”悬停时刻。庞羽的《数大象》(《作家》2024年第3期)就在当下这个时刻，不断捕获着涌现出来的记忆。作为小说关键意象的“大象”，尤其是“奔跑的大象”，在此刻与回忆交叉出现，使得小说的主人公刘珍个人成长史关键节点被一再召唤出来，中国与世界的重大历史事件也同样被召唤了出来。小说中隐晦地提示着，刘珍母亲翁虹的改嫁与中国90年代经济爆发式增长带来的剧变之间的关联。更加明显的，是范明父亲死于“911”事件。由此，个人成长史获得了一种历史性叙述的可能，当下的那个叙述主体(《数大象》中主要是刘珍与范明)也不再是一个空洞化的主体，而是被成功锚定在了历史之中。

重新开始写小说的费多似乎也在操作着这种方法，他的《底片》(《芳草》2024年第2期)写女摄影师苏亚前往北方寻找父亲认识的一个女人。父亲留下的底片与日记成为行动的根源，也正是在对“过去”的追查中，苏亚完成了对父亲与自我的重塑。与此同时，费多的这篇《到底开了多少公里》(《收获》2024年第2期)就讲述了一个到西北戈壁寻找父亲的中年男人，在对父亲的不断追忆中，他也完成了对自我的叙述。从这个方面看，董夏青青发表在《芳草》的中篇小说《停云霭霭》最具代表性。在这篇小说中，董夏青青通过利文和从绘两位“子一辈”的叙述，完成了对两位母亲一生的叙述。由“子一辈”所捕获并讲述的“过去”，在事实上也完成了“子一辈”复杂自我的阐释。正像小说中从绘得知母亲的病只是误诊之后的发疯，他把自己灌醉，然后在给利文的电话里不断重复着“我想她了”。这是一个复杂个体完成自我叙述的时刻，而这恰恰依靠的，是对上一代人的召唤方式。

科幻作者找到的“新天使”悬停时刻，总会比其他人更加遥远。在《天涯》第2期刊发的“科幻特辑”中，三位科幻作家不约而同地在未来征召了更为“古老”的过去，他们要用未来的悬停时刻来比喻“当下”。我愿意将这样的方式称为“未来考古学”，它将自己投身于一个未来时刻，回过头来勘探“过去”，这个“过去”就包含着作者把自己投身未来的“现在”，以此，他完成了对他所处时代的终极描绘，就像梁星望的《北方来客》在世界末日复活了宋代苏轼在海岛上的学生。殷继兴的《神经》与《北方来客》不同，作者并没有在小说中直接召唤古老



在这个所有人都如此狂热、迫不及待地涌入人工智能无所不知的未来的年代，文学仍在寻找“新天使”悬停的时刻，并相信仍然有“不可知”的可能，它有着无穷魔力

世界，但是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尤其是一种“悟道”的禅学方法，却作为古老世界的一种象征。同时读者看到的，是一个各种科幻元素(元宇宙、赛博格、人工智能等)充斥的县城世界，尤其是作者丝毫不吝于挪用今天这个时代关于建设与发展的话语系统。有趣的是，《神经》并没有其他“县城科幻”那样强烈的怀旧感，或许奥秘就在于未来之物试图取代的东西，在今天早已没多少人虔诚地相信了。从这种“未来考古学”的方法看，黄平的《我，机器人》同时拥有前两篇小说的特征，它既通过“四大名著”直接复活了古老世界，又通过安置现行学术话语系统来完成对未来的建设。它所提出的问题，大约也是今天多数人面对日益强大的人工智能时会不自觉疑虑的：人和机器的差别究竟在何处？

面对黄平的这个疑问，我们当然可以提出反问，人为什么就非得和机器有差别呢？很多时候，我们恰恰会把自己看作是机器人，就像庞羽《百分之七十的申小颖》(《芳草》2024年第3期)的开头，刘珍把自己、自己的母亲和孩子都视作机器人，连寄予《遥远的终结》(《上海文学》2024年第3期)中，一个杀手也要说，“我怀疑人是一种机器，有无所不能的那种人，不是人，像神那样的东西，把人造出来。”正因为如此，或许人和机器之间的主体性差别究竟在何处只是一个伪问题。真正的问题可能是《我，机器人》里诸葛亮被问到的问题，假如我们就是机器，那我们应该如何面对系统生存。这个问题在黄平的科幻小说中，或许会滑向关于命运的神秘主义，或者变成形而上的哲学追问。相较于黄平，苗炜后退了一步，他的《主人翁》直接讨论了系统中的人这样一个问题。在苗炜的这篇小说中出现了两个系统，一个是帮助警察王自在发现治安异常的“主人翁系统”，另一个则是可以诊断疾病、预测死亡时间的“大宗师系统”。有趣的是，这两个强大系统带来的绝对可控的现代生活，反而给王自在带来了挥之不去的现代生存焦虑，以至于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一开始就应该对“主人翁系统”的警报置之不理，不该追查刘芬芳帮他人安乐死的案件。但正像小说最后所宣判的，他永远不可能置之不理。这就是大数据模型赋予所有人的现代生活，它最终会完成对所有人行为方式的训练。是的，不是人类在训练它们，

而是它们训练了人类。

有趣的是，在苗炜对“系统时代”抱有悲观预测的同时，邵栋却写了一个古老的复仇故事。他在《示巴的儿女们》(《上海文学》2024年第4期)中复述了一段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中的情节，正如复述的这个故事，这个关于复仇的故事似乎发生在90年代更具说服力。不过，创意写作专业、网约车司机、新能源车等符号都在宣称这是一个属于当下的故事。或许邵栋在这个人早已时时刻刻都被暴露的时代，仍然迷恋着一种巨测的叙事，仍然相信心灵之外的具象世界存在神秘的回旋之地。那个女司机，就像是马丁·斯科塞斯《出租车司机》中特拉维斯的化身。这种神秘巨测的叙事，在其他写作者笔下还是更多与心灵世界相关，总是展现为梦境、疯癫与忧郁症，比如朱个的《小吃街》(《上海文学》2024年第3期)、程皎的《狂夏夜游》(《天涯》2024年第2期)和王薇的《欲望模型》(《上海文学》2024年第4期)。阿乙则直接选择了叙述实验，在《X宾馆》(《收获》2024年第2期)这个实验文本里，不仅仅“我”在空间上分裂为了无数种尚未勘探的可能，而且在时间上也有陷入无限循环的危险。

从这个意义上说，白琳发表于《收获》的《支离的席勒》或许是最令人着迷的文本。这个关于欧洲留学生活的中篇小说，并没有太多操弄心灵装置或者叙述试验，只是讲述了两个支离破碎的人，席勒与阮如安。尤其是阮如安，这个在小说中主要通过他人转述与社交媒体完成构建的女人，直到小说的结尾仍像是一个由碎玻璃拼贴出的不完整模型，充满了神秘和令人好奇的魅力。小说的结尾说，“我可以永远对任何事都不会了解太多”，或许这种关于“不可知”的残缺的展览，正是小说动力量的根本来源。电影《大佛普拉斯》中有这样一句台词，“虽然现在是太空时代，人类早就可以坐太空飞船去月球，但永远无法探索别人内心的宇宙。”这句台词此刻反倒变成了一种赞美，这个所有人都如此狂热、迫不及待地涌入人工智能无所不知的未来的年代，文学仍在寻找“新天使”悬停的时刻，并相信仍然有“不可知”的可能，它有着无穷魔力。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评论

穿越沧桑迷雾 寻觅苍生真相

——读王兆军长篇小说《蚂蚱》

□谭健

王兆军的长篇小说《蚂蚱》自去年问世以来，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审美视角，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和各类专家的注目。有评论说，它通过描绘20世纪上半叶鲁南地区乡村生活图景，展现了人性的复杂和多元；它是对村庄的抢救式书写，写尽了人性的善恶和生命的挣扎；作品堪称形象的民俗志和地方志，是民国时期的《清明上河图》。窃以为这还不是它的真正价值所在。《蚂蚱》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最大贡献在于，它有意地清晰地揭示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底层逻辑和生存智慧。

一部作品的真正价值，不在于是否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丰厚或增益，而在于是否提供了前人没有涉笔或浅尝辄止的东西。中国是一个农耕文明的国度，以乡村社会、农民为社会背景的长篇小说，现当代不在少数。比如沈从文《边城》的田园牧歌、周立波《山乡巨变》的社会变迁、赵树理《三里湾》的山村风貌、陈忠实《白鹿原》的家族恩怨兴衰，等等，都从不同侧面或维度描绘了中国乡村社会的世相百态和众多形象。但到目前为止，对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底层逻辑和生存智慧进行深度剖析和冷静描写的作品并不多。

20世纪上半叶的鲁南大地，蝗虫横行、匪患不断、民生凋敝，这是一个特殊时期，旧制度旧文化逐渐废弛，而新制度新文化尚未成型。作者将镜头瞄准这个遭受内外双重冲击的蚂蚱庙村，以“睿哲玄览”之目光，“湛然寂静”之禅定，“散点透视”之笔触，为读者客观描摹了一个疾风骤雨的大时代，布衣麻履的底层逻辑与生存智慧，真实记录了旧中国底层生活最后一个原生态的真实样本，正像作者自己所言，“我抓住了那条尾巴”。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逻辑，是一个具备差序格局的复杂系统，它以土地为母，以生存为底线，以好方法、为致富为目的，涉及政治制度、经济基础、社会结构、道德伦理、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礼制习俗、生活方式等诸多因素。在这些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儒释道与乡土文化，构成形而上的二元对立统一；积德行善与

坑蒙拐骗，构成形而下的二元对立统一。这些相互抵牾又和谐一致的逻辑秩序形成了一个逻辑链，自转自足又自噬，自主自洽又自闭。历史在蚂蚱庙村并非单纯的时间流逝，而是在逻辑链条上的性命侵蚀，从清末到民国，从民国到解放前夕，每一次内生修移、外力的冲击，偶尔也能打破它的平衡，但它的内生修补再生功能太强大了，一阵动乱过去，很快又周而复始、运转如常。结束了千年帝制的辛亥革命飓风，在蚂蚱庙村则变成蝴蝶翅膀扑啦一丝小风，“种地的照样劳苦，捐税未见减轻”。

在天灾人祸的轮番冲击下，在民与官、民与匪、官与匪、本村与邻村、本土与外界之间相互交错的复杂关系中，乡民们使浑身解数，拼尽全力，试图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最终还是活成一只鸡。这就是蚂蚱庙村的底层逻辑，也是当时中国乡村社会的底层逻辑。

意象，作为文学创作者的基本功，它是文学作品中的特殊符号，往往承载着作者深刻的人文思考和情感寄托，展现其独特的美学特征。艾略特的“荒原”，卡夫卡的“城堡”，博尔赫斯的“花园”，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包括陈忠实的“白鹿原”，都是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重要元素。“蚂蚱庙”这个意象也属匠心独运。它借鉴了西方的超现实的元素、梦境、幻觉等手法，但更多地融入了中国的神话、传说、志怪等元素。我们从宗申的呼唤雨、周大的命运转换、向守德的善善恶报应等，每每能看见《易经》的卦象草草，偶尔也能感受祝由术的神秘传奇。没有它，小说中的所有虚构、魔幻、超现实的情节和细节，都经不起推敲。

在蚂蚱庙村，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欲望、喜好、追求和梦想，有着自己的生活和命运走向。但人如草芥，命如蝼蚁，都像一只只蚂蚱，知晓自己的宿命，仍然奋力地在贫穷、落后、愚昧、无知的逻辑链条上蹦跶。可以说，蚂蚱庙这个文学意象包括双重意蕴，一是作为蚂蚱，它是个体生命的象征，既承载着人们挥之不去的苦难记忆，又包孕着人性中的贪婪和残忍，一生一

世都在通过拼命蹦跶，来耗尽生命所固有的能量。诡异的是，蚂蚱一旦聚众成势，又能铺天盖地，横扫大地，成为一种社会灾难。这时的蚂蚱就不再是那个蚂蚱，而是潜藏在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原始意象和原型，集体无意识驱动着村民悄然嬗变，异化为蚂蚱的对象物——蚂蚱庙，成为蚂蚱的崇拜对象，从而主宰着蚂蚱庙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蚂蚱》独特的美学特征就此显现了：蚂蚱庙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和叙事元素，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它构成一种心灵的投射，象征着一种集体无意识和乡村的信仰体系，隐喻了乡村社会面临的种种困境与挑战，不仅成为一个展现特强与凌弱、生存与毁灭、尊贵与卑微的冲突与挣扎的场所，而且象征皇权、纲常、礼教、规则等隐形存在。乡民面对困境时的选择和行动，不只要受到个人性格和经历的影响，更要受到蚂蚱庙的制约和牵引。蚂蚱庙村的每一次风波与动荡，每一次人性的挣扎与冲突，都与蚂蚱庙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关联。比如癩道，他由邪恶中残存的善念画出的人生轨迹，不仅是作为一只蚂蚱面对困境时的无奈与选择，更多的是蚂蚱庙背后的“草蛇灰线”。小说最后对收官之笔封神，也都是在这个神秘场所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蚂蚱庙这个文学意象，其双重意蕴的交织、叠加与呼应，使得小说的情节更加丰富多彩，人物形象的塑造更加多层次多维度，不仅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感受作品的主题和情感，丰富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和审美价值，还能够传递作家的哲学思考和价值观念，深化我们对乡村社会底层逻辑与生存状态的认识和理解。

许多评论家论及，这部作品在艺术形式上有创新，比如散点透视的方法、章回体的结构、相对独立的故事等。所言不虚，如今长篇小说很少出现这样的追求，有人说能感受到聊斋的韵味，诚哉斯言！同时我也由此设想，作者如果在语言上像聊斋一样，用比较浅近的文言叙事，那这部小说在现当代的长篇小说中，就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此在”，从而成为区别于众多作品的“彼在”。

关注

海飞的小说是容易辨认的，其辨识度一方面来自其行文风格，他一直操持着一种纯粹又迷人的文字气息，那个略带南方口音具有高识别度的叙事声音，不动声色的娓娓道来里又分明缠绕着志忑、慷慨和悲悯，甚至还浮动着丝丝谍战情节之激烈残酷相错位的舒缓与抒情，比如文本中叙述具体时间地点的句子，一般都不会直接简单交代，总会前缀很多“非必要”形容词，这带给读者一种感觉，在那么紧张的场域和氛围下，作者以及视角人物还偷闲在凝视和感受周遭。当然，海飞谍战小说的辨识度除了行文中叙事的独特腔调，更大程度上来自他对谍海沉浮中人性深度和张力的探索与表现。谍战题材的特工角色一般有两种：一种是给定性的，比如《黎明之前》的水手、《伪装者》的明楼、《麻雀》的宰相、《悬崖之上》的张宪臣、《刀尖》中的莫愁湖等，他们一出场就是信仰坚定、身手矫捷、神机妙算的高手，总能完成那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深谙潜伏之道。另一种就是成长性的，比如《伪装者》中的明台，他们的信仰与能力建构贯穿整部小说的叙事。而海飞塑造人物和叙事的着力点，他写得最有耐心、最成功的正是那些糊里糊涂、阴错阳差开始潜伏生涯的角色，《麻雀》中的徐碧城、《惊蛰》中的陈山，以及《大世界》中陈昆小组的诸多成员们。

《大世界》中，海飞把对这种成长性特工的偏爱进一步放大，主角朱三(潜伏身份陈昆)，以及执行任务过程中依次出现的那些角色，都是如此。朱三伪装成陈昆的故事，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人如何扮演好另一个人，海飞在创作谈中就讲“这个小说要讲的，是一个人需要经历多少，才能真正成为另一个人”。而朱三扮演陈昆的逐渐投入过程，就是人物作为特工、作为革命者在信仰、能力等方面的成长过程。在扮演陈昆之前，朱三一直以魔术师的身份潜伏，小说中有一段写到“这三年时光里，没人和他接触，没有接到过任何任务，这让他产生一种错觉，他的真实身份就是一个变戏法的”。因此，在接到任务之后，朱三最初的反应不是兴奋和决然地“上岗”，而是有点迟疑、志忑甚至想抗拒，书中写道“这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度日如年，每天就像是走钢丝，与其胆战心惊如履薄冰，还不如干脆把自己灌得烂醉如泥”。扮演陈昆的九年时间里，朱三必须说服自己，对陈昆的一切照单全收，但这也是对自己的压抑和舍弃。小说中有一个细节，朱三以陈昆之名潜伏进敌营之后，某次聚餐时当牛排端上来的时

候，他却特别想吃一碗缸鸭狗，一种地道的宁波小吃，此刻的朱三必须在最细微但也是最难以改变的饮食习惯上使劲压下“朱三”而强作“陈昆”。与这个细节构成呼应的，是后文中朱三自己的父亲、孩子和妻子一个接一个地牺牲——从食物口味之小到至亲生命之大。而伴随这种巨大的隐忍和悲痛的，是朱三作为革命者的成长。《大世界》中的其他人物，老路、小蜻蜓、潘水，还有因为要为妻子报仇而加入革命的严守家，作者都在刻意塑造他们作为普通人的一面，他们在革命事业当中，仍然有对自己生活的小打算、小期待。小说中有大量宁波风土人情的描绘，这种描绘正是基于那些身为特工的人物的普通人视角，他们在革命、斗争，也在生活和活着。正如作者自己所讲，“塑造群像也是这小说的风格之一”，但在真正的考验面前，在关键时刻，他们都克服了普通人的恐惧和怯懦，舍弃了普通人对安稳人生的本能眷恋，为执行任务、坚守机密而做出了牺牲。由此，这部小说也真正实现了海飞自己所期待的“一个复合的、多种情感与人生纠结的小说”。

《麻雀》里的徐碧城为了寻找爱人而主动深入敌营，《惊蛰》中的陈山为了救自己的妹妹而被迫成为伪装者，《大世界》中的潜伏者在革命的同时，各自怀揣自己对生活和人生的愿景，这些特工菜鸟，还有“废柴特工小组”，他们可能都是为了个人目的卷进时代风云，这个出发点是可信的、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是最正常的人性舒展和人情表达。而在残酷的战斗中，经历了许多、目睹了许多，那些残忍、荒诞警醒了他们，那些牺牲、无畏感染着他们，家国情怀与革命意志被具体的环境和战斗渐渐唤醒，信仰也逐渐明晰。这样的角色塑造，恰恰最真实地呈现出战争年代一个个普通人，他们的内心成长与信仰构建过程，无论是出身于角角混在上海滩的包打听、来自上流社会的知识女青年还是如《大世界》中朱三、小蜻蜓、老路这样最普通的小人物，这样的人设，是合乎生活逻辑和文本逻辑的，他们最终的政治立场和人生信仰的选择，更符合叙事说服力与合理性。

作为近些年充分类型化、经典化的叙事题材，谍战，一直持续引发着文学界和大众文艺的双重瞩目。而当海飞这位当下非常高产的谍战小说“专业户”又有新作品出版的时候，我对这部《大世界》的期待不仅仅是通常意义上对优秀谍战小说的期待，惊心动魄的情节和冲突、烧脑的悬疑设置甚至人情人性上的探索等等之外，这一次，我感兴趣的是，《大世界》有没有提供什么新鲜的东西，比如谍战“新人”，比如对“谍战”更深层次的认知与理解。所谓高度类型化和经典化，其实就必然包含着固定的人物套路和情节模式，但对模式和套路的突破，又永远成为创作和阅读的期待。李敬泽谈及麦家小说时曾讲过，谍战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背景下开辟了一个新的对人的想象向度，不是日常生活里那个“欲望”的人，而是极端情况下那个“意志”的人。这是对谍战题材创作非常精准的评价。作为一名潜伏在敌营的伪装者，真实身份与伪装身份之间的巨大分裂，一个自然人的正常情感建构与流露与特工的立场和职业诉求之间复杂的交错关系，“我是谁”身份的迷失与确认……对一个人的精神和灵魂实在是巨大的折磨和考验。这类题材作品必须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有效地实现一个谍战故事的可信性与说服力？如何去想象和感受那些远在我们当下生活图景和生命经验之外的现实疑难与精神困境，如何把它变成自己贴身切骨的一部分，再淋漓尽致地表达和传递给观众。这也是谍战小说必须解决的底层逻辑问题。谍战题材最大的正面精神价值正源于此，除了精彩重现战争年代的风雨飘摇和百转千回，更要走近彼时彼地那些人的内心，他们正在承受的现实痛苦与精神煎熬，以及抵御这些痛苦煎熬的灵魂力量。谍战题材最深层的魅力所在，也许就是在惊心动魄之中向我们展示那个“意志”的人，这个人是我们这些侧身在外的人读者和观众基于自己当下的经验和经历难以代入和共情的，所以他们是传奇；而作者一方面渲染强调着人物与我们日常的距离和差异，一方面却也在努力试图开辟一些路径，让我们能够从某些共通之处去感受和体会他们——所有传奇的张力，大抵如此，那么近，又那么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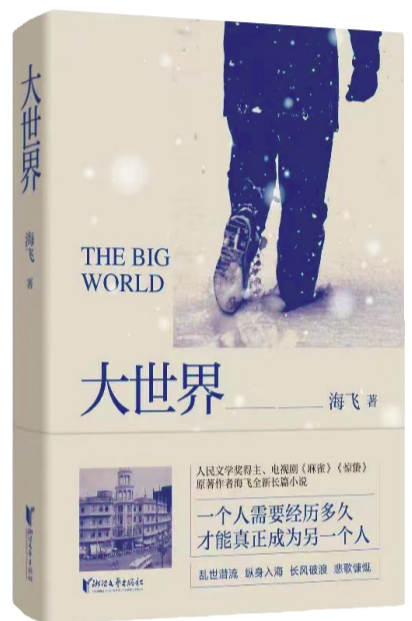
当我们看过许许多多多个谍战故事之后，我们期待的是那种既在经典模式中又出乎套路之外的人。观众和读者最想看到的，其实就是“熟悉的陌生人”，人们的审美期待永远都是在凡俗人生中获得传奇，而在传奇中又要能时不时共情到人性与人情上的普遍性。而《大世界》在这个角度提供了非常好的范本，在重现革命往事、勾勒特工群像的过程中更实现了对谍战小说叙事套路和人物模式的一次突破。

(作者系河北省作协文学院副院长)

往事·群像与『谍战』的突围

——关于海飞长篇小说《大世界》

□金赫楠



《大世界》，海飞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24年4月